

火
花
集

罗世庆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火 花 集

罗世庆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黔新登字(90)04号

责任编辑 元 华

封面设计 吕凤梧

火 花 集

罗世庆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八角岩省府大院内)

贵州新华技术实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75印张 105千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册

ISBN 7-5412-0238-X/G·57 定价：2.20元

序

王里明

罗世庆同志写作的《火花集》出版问世了。这本言论集，用较多的篇幅突出地反映了民族工作和统战、政协工作。在贵州这样的书为数还不多，值得祝贺！

罗世庆同志出身于一个比较贫苦的少数民族农民家庭，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起来的新闻工作者。他勤奋好学，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多年，跑遍贵州各地，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他主要是采写新闻报道，同时也写过不少言论。由于他的出身和经历，形成他的言论的风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开门见山，直言不讳，有较强的针对性；密切联系现时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反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呼声。这些言论对于初学写言论的同志和作实际工作的同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中所收集的《赏花有感》、《让少数民族女孩多上学》、《不能以酒论民族优劣》、《群众盼下雨，干部盼下文》、《应扫一扫“统战盲”》、《珍惜发言权》、《核心 中心 人心》等作品，都是作者经过一定的调查研究，在实际生活中有所感而发的，思想性比较强，在报刊上发表以后，受到读者较好的评价。本书所收集的作品，有的虽是七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是五十年代写

的，现在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还能给人一定的启迪。

本书的出版，是罗世庆同志几十年努力学习、勤奋工作的结果，也是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在党的关怀培养下取得的成绩。今后，愿更多的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奋发向上，努力学习和工作，创造更丰硕的成果。

目 录

序.....	王思明 (1)
强盗去了杀壁头.....	(1)
既要忘我又不能忘我.....	(2)
认认真真地学 扎扎实实地干.....	(4)
“‘属牛’的干部就是好”！.....	(7)
“玩表”小议.....	(9)
“君子”动口，小人”动手.....	(11)
“大家忙”赞.....	(13)
不该“留一手”！.....	(14)
这个决心下得好.....	(16)
不可小看“修修补补”.....	(17)
深入持久地开展五讲四美活动.....	(18)
食品卫生非抓不可.....	(21)
不能向富裕户搞“捐献”之类.....	(23)
从比较中找富裕之路.....	(24)
党要管党.....	(26)
赏花有感.....	(28)
有远见之举.....	(30)
应向谁学？.....	(32)
要讲职业道德.....	(33)
保护个体工商户的合法经营.....	(35)

要重视群众的批评.....	(36)
《嗨啦啦》应如何唱?	(38)
从抓鱼想到报纸批评.....	(40)
莫把财富当“包袱”	(42)
向爱听赞歌者进一言.....	(44)
提倡群众办电.....	(45)
必须抓好民族教育.....	(47)
本来就闭塞, 为何还要卡?	(50)
重视发挥在乡的中小知识分子作用.....	(53)
让少数民族女孩多上学.....	(55)
努力把资源变成商品.....	(58)
发展民族体育 繁荣民族文化.....	(60)
重视“多民族”这一特点.....	(62)
不可以酒论民族优劣.....	(64)
从民族蜡染和土花布出口谈起.....	(66)
过好民族节日.....	(68)
重视智力支边.....	(70)
“群众盼下雨, 干部盼下文”	(72)
智力支边深受各族人民欢迎.....	(74)
人民政协工作大有可为.....	(77)
不应回避 无需害怕.....	(79)
民族工作不仅是经济问题.....	(81)
不要不好意思.....	(82)
禁止民族歧视.....	(84)
开方还需拿药人.....	(85)
民族工艺品生产大有可为.....	(87)

重视民族卫生工作	(89)
要强调各民族的团结	(91)
称“族”称“家”的联想	(93)
在新的年代做出新贡献	(95)
珍惜发言权	(98)
赞开拓型、高标准	(100)
应扫一扫“统战盲”	(102)
智力支边大有可为	(104)
贯彻民族政策要全面	(107)
政协不是休息机关	(109)
大快人心之余的反思	(111)
认真贯彻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	(113)
努力发展我省爱国统一战线	(116)
加强统战工作 促进民族团结	(119)
劝君莫吃书报费	(122)
向在政协的共产党员进一言	(124)
认真学习开好会 发扬民主献良策	(126)
国营企业要抓统战工作	(129)
昔日吃尽没有文化苦 今朝家有五名大学生	(131)
核心 中心 人心	(134)
身教胜于言教	(136)
贯彻上级指示要从实际出发	(137)
欢度国庆 思念统一	(140)
拼命与保命	(142)
为农田基本建设献计出力	(144)
后记	(146)

强盗去了杀壁头

“强盗去了杀壁头”的意思是说，强盗已经跑了你才开枪，枪弹只能打壁头，根本打不着强盗。这是贵州人的一句俗语，是用来形容那些工作慢吞吞、放马后炮、没有把劲用在火口上的人的。可是这种人，现在还是有。

最近我看到了不少铁木农具厂，都在大造打谷机，可是这些地区的谷子都快要收完了。农民们没有及时买到打谷机，只好用围席挞斗。我问他们：“谷子快要收完了，为什么不抓紧造深耕工具，反造打谷机呢？”答复是“还早，这批打谷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完成了再造深耕工具！”听！这是什么算盘呵！等你造打谷机的任务完成，恐怕秋耕又快要结束了，那时，不仅农民们今年用不上打谷机，深耕工具也用不上，何苦尽放马后炮呢？

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里，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闻风而起的共产主义风格，跑在时间前面。秋种已经开始，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深耕工具，不是打谷机，希望把不急用的工具缓制，大力制造急用的深耕工具，要争取主动，当促进派，不要再作“强盗去了杀壁头”的人了。

（载于1958年10月7日《贵州农民报》第一版。本名）

既要忘我又不能忘我

有人说，雷锋同志真是一个处处忘我的好战士，从而得出结论：做一个共产主义好战士，应该是一切都要“忘我”。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够全面。

有时“忘我”是一种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如劳动不计报酬，吃苦在人前、享受在人后，等等；有时“不忘我”，也是一种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如时刻不忘记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忘记我是人民的勤务员，等等，一句话，就是不忘记我对人民所应负的责任。雷锋同志的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就是这样，既表现在“忘我”的一面，又表现在“不忘我”的一面。

雷锋同志的日记中，有许多地方都提到“我”。当他刚参军时，他写道：“我，一个在旧社会受苦受罪的穷苦孤儿，居然成为一个国防军战士，……我一定不辜负党对我的教育和期望，我决心保持和发扬×××矿全体职工的光荣；军政学习争优秀，全心全意保卫国防，成为一个优秀的国防战士。”当他入党以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当他闭上了眼睛的时候，才有权利停止斗争。’我决心为党和阶级的最高利益斗争到底”。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雷锋同志也没有“忘我”，他说：“我是党的儿子，人民的勤务员。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我就在哪里工作。”从雷锋同志所说

的和他的实际行动中，我们看到，雷锋同志是既忘我又不忘我。他不忘记自己在旧社会所受的苦，不忘记是党救了他，不忘记自己在新社会的责任，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才能忘我地去工作、学习和劳动，忘我地为人民服务。可见，“不忘我”并不都是坏事，问题是看怎样地“不忘我”。如果这个“不忘我”的“我”指的是一己之私利，个人的名位等等，那确实是要坏事的，这就会把自己引入歧途，甚至腐化堕落，蜕化变质，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如果这个“不忘我”是雷锋式的，那就会时刻记住自己是受党和人民的委托做工作的，在自己的一切言论、行动中，就会具有对党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的高度自觉性和责任感，严肃认真，兢兢业业，丝毫不懈怠疏忽，不使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这样也才能经常检查自己，加强自我思想改造，使自己在取得工作成绩时，不骄不傲，努力前进；在和平环境中，则保持艰苦奋斗、勤劳节俭的作风，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单独工作的时候，则能“慎独”等等。总之，这个“不忘我”正是为了使自己努力成为人民的好勤务员，使自己更好地保持革命传统，发扬革命精神，忘我地去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斗争。

（载于1963年10月25日《贵州日报》第三版。本名）

认认真真地学 扎扎实实地干

我省赴湖南参观学习团的同志，满载湖南人民的革命友情和宝贵经验胜利回来了。目前，参观学习团的同志正向全省人民汇报学习收获和介绍湖南的先进经验。全省人民认真学习湖南人民的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将会把我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更快地推向前进。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毛主席的指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老老实实地、认认真真地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继续革命，永远向前。

然而，却有一些同志，对于本地区、本单位的一些好经验看不见，不去认真总结推广，对于外地的先进经验又不去虚心学习，满足于现状；在生产上总是老思想、老办法、老品种、老产量。这就是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夜郎自大。这是大干社会主义的绊脚石、拦路虎，这是造成生产发展的步子不大，山河面貌改变不大，对国家贡献不大的思想根子。我们学习湖南，首先要思想上来一个革命，坚决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夜郎自大。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湖南人民坚持不断革命精神；学习湖南各级党组织坚持整党整风，加强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的经验；学习湖南人民坚持自力

更生、战天斗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先进事迹；学习湖南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参加劳动，狠抓典型，以点带面的领导艺术和优良作风；学习湖南人民为革命种田的思想。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湖南省桃源县庄家桥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光庆同志说得好：“为吃饱肚子种田，亩产五、六百斤就够了；为革命种田，亩产三千斤也不能满足。”他1974年就提前实现了“年满七十，粮过三千”的誓言，但仍不满足，又提出“年满八十，粮过四千”的奋斗目标。1976年，他又创造了亩产3403斤的新纪录。我们就是要认真学习这种永不自满的不断革命精神。

湖南、贵州山水相连，为什么贵州与湖南的差距那么大呢？是贵州的土地气候条件差吗？不是！“贵州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丰富”。是贵州人民落后吗？更不是！贵州人民勤劳，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贵州的落后，主要是错误路线的干扰和“四人帮”的破坏。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挖掉了祸根。只要我们各级党委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认真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扎扎实实地工作，贵州是大有希望的，定能后来居上。

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影响，在我们的一些干部中，滋长了一些不良作风，也影响了农业的迅速发展。有的干部只是讲在嘴上，写在纸上，就是不落实到行动上。有的干部，只是叫别人干，自己就是不带头干。有的干部，忙忙碌碌，东奔西跑，胸中无全局，手中无典型。用湖南同志的话来讲，就是没有牵住“牛鼻子”。我们学习湖南，就必须坚决克服这种不良作风，扎扎实实地干，干出个样子出来。各

地区、各部门，都要根据湖南的经验，在干的过程中，认真修订和补充自己的规划，并切实付诸实施。各级党委一定要抓好典型，办好样板，以点带面。实践证明，哪个地方有典型，哪个地方的工作就活跃；哪个地方没有典型，哪个地方就死水一潭。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各级干部要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努力做到县、社、大队干部每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百天、二百天、三百天的要求。要尊重客观真理，坚持按唯物论辩证法办事，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大力表彰那些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斗争站前头，劳动能带头，工作有劲头”的好干部，好党员。对那些“抓生产没有力气，改变面貌没有志气”的干部，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提高他们继续革命的觉悟，使他们积极投入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

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学是前提，干是关键。学了不干，等于不学。我们学习湖南人民的先进思想，先进经验，就是要鼓足革命干劲，扎扎实实地去干，让湖南的经验在我省迅速开花结果。在党的十一大精神的鼓舞下，我省革命和生产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全省人民一定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虚心学习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革命加拼命，努力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为实现“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而奋斗！

（载于1977年9月28日《贵州日报》第三版，社论）

“‘属牛’的干部就是好”！

民间不少人习惯用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12个属性来推算年代。如1977年，农历是丁巳年，用属性来推算就叫做“蛇年”。如果是1977年生的人，民间就会有人按习惯说他是“属蛇”的。

一个人是哪一年生的，或者说是“属什么”的，这只不过是一种计算年龄的方式，毫无褒贬之意。可是，最近在农村却听到一些贫下中农、社员对于“属什么”增添了新的内容。他们用“属什么”来作比喻，生动而又形象地对一些干部进行表扬和批评。他们说：某某干部是“属牛”的，好象个老黄牛，踏踏实实地劳动，勤勤恳恳地工作；某某干部早晨是“属猪”的，喜欢睡懒觉，中午是“属蛇”的，怕阳光，老是躲在树荫下乘凉，不愿与群众一块劳动，晚上他又变成“属虎”的，到处去开会象虎那样乱吼乱叫吓唬人。

贫下中农社员很喜欢那些“属牛”的干部。他们赞扬说：“不少干部是‘属牛’，‘属牛’的干部就是好！”鲁迅先生主张“俯首甘为孺子牛”，也是喜欢“属牛”的。至于那些“属猪”、“属蛇”、“属虎”的干部，广大贫下中农不仅讨厌，而且感到害怕。

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对于我们每一个革命干部来说，如果真是要革命的话，就应该好好地向那些“属

牛”的干部学习，扎实实地为人民办事；特别要不辞劳苦地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去，为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多作一些贡献。对于那些“属猪”、“属蛇”、“属虎”的干部，虽然是极个别，但应批评教育，使其改正。

（载于1977年12月15日《贵州日报》第三版。本名）

“玩 表”小 议

1979年12月24日，《贵州日报》一版上发表了《布依族青年又能够“玩表”了》的报道，许多人看了以后，拍手叫好。但也有一些人有不同看法。他们说：“有人利用这种方式来谈多角恋爱”呀，“引起打群架、械斗”呀，“对这种‘玩表’习惯，不宣传为好”呀，等等。如果在3年前听到这些议论，并不奇怪，正如报道中所说的，“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玩表’被打成‘四旧’、‘不良作风’而遭到禁止”。但是，现在还是这样议论，确实令人深思。

什么叫“玩表”？报道中说得很清楚：在贞丰、关岭等地，“‘玩表’也叫‘赶表’是布依族男女青年进行恋爱的一种方式”。布依族叫“玩表”，苗族叫“游方”，说法不同，意思一样，都是“进行恋爱的一种方式”。各个民族有各自的风俗习惯和社交形式，应该互相尊重，不应该非议。把一种恋爱形式视为正常，而把另一种恋爱形式视为不正常，是不合理、不公平的。至于说什么“多角恋爱”、“引起打群架、械斗”等，是站不住脚的。不管哪一个民族，哪一种恋爱形式，也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有不可思议的事发生。

《贵州日报》1979年12月15日刊登的《她为什么自杀》和6月22日刊登的《砸碎封建包办婚姻的枷锁》等报道，就是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应当说，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青年，通过“游方”、